



敬业乐群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

周汉民 主编

□ 教师篇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敬业乐群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

周汉民 主编

□ 教师篇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业乐群·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教师篇 / 周汉民
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439-6398-6

I . ① 敬… II . ①周… III . ①黄炎培 (1878~1965) —
职业教育—教育思想 IV . ① G7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2171 号

责任编辑：于学松

封面设计：翁政盟

敬业乐群·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教师篇

周汉民 主编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650×900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41 000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398-6

定 价：38.00 元

<http://www.sstlp.com>



黄炎培先生肖像

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周汉民

副主任：马国湘 李 明 马庆发

编 委：周国平 陈伟忠 徐汇言 毕鹏宇
方孟梅

校 对：黎同炎 王黎明 何朝霞 邵 婷
黄婷婷 茹 蘅 朱 懿

序

周汉民

97年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自此,职业教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的教育百花园也从此别具一番风景。

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职教人积极投身职业教育实践。1918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相继培养了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有实验性的学校”。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平民促进会和东南大学,在江苏徐公桥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等乡村事业30多项。1927年起相继在上海、南京等地成立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职业教育事业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之象。

黄炎培等职教先辈不仅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新的实践,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思想。“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金的人格,铁的纪律”等凝练的语言,至今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职教先辈们辛勤笔耕,一篇篇文字鲜明地诠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上海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祥地,近百年来为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发挥“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特点和优势,大力开展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实践,努力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大力实施“温暖工程”,努力开拓海内外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组织发展。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从黄炎培大职业教育思想出发破解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瓶颈,提出上海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形成具有全国领先水平和经济发达地区特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局面。

教育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新的职业教育形势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就在这个时候,乘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东风,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纂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也陆续出版。这既是对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呼应,也是充分发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现实指导价值的重要实践。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由学生篇、教师篇、综合篇组成,各篇独立成册。《读本》的内容主要选自黄炎培先生

的文章和日记,原汁原味地展现其不同时期的主要职业教育思想,以飨读者。这对于学生学习态度的树立和职业技能的学习、教师职业教育教授方法和技巧的掌握、管理机构对职业教育事业的统筹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适逢《读本》付梓,欣然为序。希望其能成为各位读者学习工作常备之物,并能从中有所得、有所用、有所思、有所乐。若此,则为黄炎培职教思想之幸、职教事业之幸,亦为我们编委会之幸。

2014 年 11 月

代前言

忆念吾父黄炎培

黄大能^①

吾父黄炎培，字任之（1878—1965），到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我们将有十六年了。吾父曾因在乡间办学校，反对科举，反对封建，为此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一九〇六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运动。他一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和爱国民主活动，在中间路线几经碰壁后，终于认清了只有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投身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晚年做了多年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官和人民的代表。

作为他的子女之一，忆念他的生前形象，他的言行举止，他对我的长期思想熏陶，现在把留在我脑海中比较深刻的片断回忆记录下来。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我的中学生时代，正是父亲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他把我

^① 黄大能（1916年8月29日～2010年7月6日）系黄炎培四子，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原文载《八十年来》，黄炎培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从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化的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转移到他所创办的平民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这个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并有严格的校规。男学生剃光头，穿蓝色工服，接受中等专业技术训练。父亲多次告诫我：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才，必须从中等学校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即使你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你的专长。

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目睹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毒素蔓延。以后，一九一五年吾父报聘美国商团，参加游美实业团担任编辑报道。旅美三月归后曾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先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主张，又赴菲律宾考察，得到许多华侨的拥护，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的宣言书上签名的有当时南北前辈名流蔡元培、蒋梦麟、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郭秉文、聂云台、宋汉章、穆藕初等，还包括许多教育和实业界人士，提出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当时教育政策的大改革。为了通过实践证明其主张的正确，翌年就创设了中华职业学校。当时设有铁工、木工、纽扣、珐琅各科及附设各种工场，以适应当时国内的亟需。以后改设了机械科、土木科、商科等。由于学校充分发挥了勤劳朴素和手脑并用精神，又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竞相邀聘。记得我在一九三四年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毕业后，和若干同学被派赴湖南衡阳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实习。中华职业学校规定毕业后实习一年成绩优良才发证书，而我们这几个毕业生都有出色成绩，都得到十分好评。我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描绘及设计了大小

桥涵图纸百余张,主管总工程师评以不亚大学毕业生。这当然和在校时接受刻苦并且实用的教育分不开的。虽然以后我又入大学,又出国进修,而抚今追昔,实乃奠基于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的三年就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受到各方重视。海外有南洋华侨(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国内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界巨子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穆藕初、刘柏生等)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因此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在北京政府的新学制中确立了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职业教育地位。当时职业教育已成为一时风尚。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创办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的三十二年中,除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先后培育七千余名毕业生外,还办有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堰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还在上海办过七个职业补习学校。为了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就业,从一九三四年起,在上海又办起一个职业指导所,以后在重庆、桂林、昆明都办了起来。一九二六年在昆山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实验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八一三以后,职教社在川、滇成立分社或办事处,都设有学校或工厂。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有一百二十多种书刊。其中《教育与职业》期刊连续出版三十多年之久。邹韬奋同志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曾是职教社所办的刊物。以后还出版过《国讯》《展望》等进步期刊。

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一定联系的是一九二四年吾父另又创设了一个专门搜集、整理、分类和保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组织。因创设之年岁次甲子,故称“甲子社”。一九三一年改称“人文社”。我父曾说:“这些工作,原该政府主办,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不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哪里会想到办这些赔钱的事。所以只能由我

们百姓来担当。”确实，甲子社成立后为了筹措经费，煞费苦心。正临绝境之际，幸得叶鸿英先生一九三二年慨捐五十万元（当时合黄金万两）作为办社基金，于是改名“鸿英图书馆”。这个组织一九三〇年起出版《人文月刊》，前后八年，共出八十册。到一九三五年止，藏书64 802册、图表219幅、报纸49种，选辑各种史料达一百多万件，杂志日报的要目索引达十五万多片。

吾父提倡职业教育中曾遭国民党政府多次打击，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到上海，江苏省教育会被封闭，财产被清算没收，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都被暴徒捣乱。吾父被扣“学阀”之名，与军阀一起在被打倒并通缉之列。吾父于是再度亡命，去苏联未成而走大连。留下的职教社的工作幸得江问渔、杨卫玉几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苦撑维持。然而当时职教社已誉满中外，国民党虽然忌恨，也无可奈何。职教社在这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始终不曾停止活动。在重庆活动中，还得到中共组织的支持。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及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常与吾父接触。周总理还曾为《国讯》写过文章，并于一九四〇年在职教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上作过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当时轰动了山城。

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是这样维持到全国解放，获得新生。到一九四九年止，在全国联系的社员已达三万之多。上海雁荡路还有自建的社屋。解放后，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继续进行各种教育活动，创办了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和中华函授学校。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举行立社四十周年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参加了纪念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

参加辛亥革命

吾父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二十岁左右时，血气方刚（一九〇一年生我大哥，取名方刚），虽曾乡试中举，却决计跨上新文化教育岗

位。先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就学。在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下,增强了办学校以唤醒民众扫除愚盲的决心。于是一九〇三年在川沙县和几个朋友一起办起小学堂来,标榜要反对封建统治,用新教育来救中国。正课以外,到处请人演说,宣传清廷腐败,外国侵略面临国破家亡,宣传吸鸦片、赌钱、女子缠脚都是亡国弱种的勾当等。听者人山人海,触痛清廷。在六月间的一次新场镇的演讲会上,被地方痞棍密告南汇知县戴运寅,以毁谤皇太后、皇上的罪名,把吾父及顾次英(号仲修)、张志鹤(号伯初)、张尚思(号恂九)四人拘捕起来,当作革命党,报请两江总督魏光燾、江苏巡抚恩寿批准就地正法。就在批文到达前一小时,这四个青年被上海基督教洋人总牧师所保释,而吾父和顾、张两难友在同情者的资助下一起亡命日本了。

其实那时国内还没有什么革命组织。同盟会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吾父亡命日本一年归来,因事过境迁,未再追究,于是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其中著名的是上海浦东中学,它是由建筑工人起家的杨斯盛先生毁家兴学先后捐银二十四万两所创建的。

一九〇五年七月,吾父应蔡元培老师之招到他家里。蔡告以:“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结合起来的,你愿意加入否?”父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而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吾父接蔡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保管党员名册。曾招待过路的革命领袖廖仲恺等。孙中山先生当时亦曾坐法国兵舰过沪,从船上招往相见,但错过机会未遇。吾父与中山先生的亲切谈话,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孙先生卸脱政权在沪闭门写《孙文学说》之时,忽招吾父畅谈“知难行易”的道理。当时宋庆龄先生亦在座,并共餐。

辛亥革命前夕，吾父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吾父即留在苏州工作。接着程德全率军攻下南京，驱走清廷走狗张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程德全、黄兴等集合各地民军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共和联合会。会场就设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该次会议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还建议以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江苏省教育会的前身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是由吾父和沈恩孚（信卿）、姚文楠（子让）、袁希涛（观澜）、杨廷栋（翼之）等发起成立的。当时推张謇为会长。这个虽属民间的教育性组织，由于这些人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成为不仅在江苏而且为全国的教育领导中心。吾父当时通过对全省大部县份的调查，对全省教育设置作了通盘安排。特别由于他发起成立了一个教育经费管理组织、划出几种省税作为教育专款而使江苏省的教育当时得以在全国领先发展。辛亥革命后，吾父在江苏都督府负责教育科的两年内，曾创建、改建及扩建了省立二十四所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大量县立小学。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后吸收侨资，迁沪）、河海工程学校、江苏蚕桑学校等都是该一时期先后成立的，吾父这些活动也为以后办职业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八·一三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帝入侵我东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淞沪十九路军抗日战争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我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在沪高中到大学的青年时代。两次战火都在我身边燃烧。而吾父对我的身教言传，给我深深地灌输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

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时期是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作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民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各大学学生组成的赴南京请愿团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到达北火车站僵持。当晚我父竟和我母深夜亲来车站慰问。在朦胧月色的站台上,父母对我谆谆嘱咐,吾父在我耳边低声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

早在一九三一年春,吾父偕江问渔先生等到日本考察教育。当时已发现日本反华战备气氛极浓,在乡军人十分活跃,并曾购得三本充分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归后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时,王竟大笑,说:“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某岂能知道?”直到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到南京面诘王正廷时,恰逢抗日请愿学生冲入外交部。王因会见吾父而不及躲避,乃被殴伤。吾父在日记上大书:“活该!”这也说明蒋政权对日是蓄意不抵抗的。

延安归来

一九四五年六月,吾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与褚辅成一起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吾父六月二十二日

得回电欢迎他们访问延安商谈国事。于是，父偕同褚辅成、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七月一日至五日从重庆飞延安访问了五天。这个短短的五天，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抗战已入末期，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由于蒋政权的种种破坏，几濒破裂。常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也已回到延安。吾父只是抱着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与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七十四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原有严厉的书报出版审查制度以扼杀进步言论，而这本书拒不送审竟突击出版发行。出版当天，特务四处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并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而造成以后特务在重庆张家花园菁园吾父居处抄家搜查的暴行。

延安访问时间虽短，吾父有机会认识了大部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促膝长谈。这里有两段从《延安归来》中摘录的文字记载，反映了吾父在延安的见闻和当时的政治态度。

吾父曾在延安欢迎大会上发言：

……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

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另有与毛主席问答的一段：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有效的。

以上这段对话，即使从三十五年后的目前政治形势看来，也还是